第一章

青少年时期

诞生杓子冲

在长江中游，华中腹地，有一块美丽的大地——湖南，它因地处洞庭湖以南而得名。境内最大河流——湘江流贯全省，因而简称“湘”。据说，过去湘江两岸芙蓉极盛，唐代诗人谭用之在《秋宿湘江遇雨》中写下了“秋风万里芙蓉国”的名句，由此，湖南又有“芙蓉国”的美称。由于湖南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拥有肥沃的平原，宽广的盆地，低缓的丘陵，加上气温偏高，雨水充足，无霜期长，素有粮仓之称。就是这块富饶美丽的大地，有着悠久的革命历史，蕴育出中华民族的众多英才。

宁乡县是湖南重要县区之一，也是人杰地灵的一块地方。它位于湖南省东部，益阳地区东南部，东接望城，与长沙为邻，南连湘乡、湘潭，西界安化、涟源，北邻益阳、桃江。西南与西北多山，大沩山、雪峰山为主要山脉。中部沩水右岸多丘陵。贯通县境东西的沩水和靳水，流汇湘江而入洞庭。水运交通便利，陆路至长沙不及百里。山川形胜，物产富饶，特别是产于流沙河、草冲一带的宁乡猪享誉古今。

杓子冲位于宁乡县城以西 70 多公里处的沙田乡长冲村。清光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绪年间，杓子冲曾是一个偏僻闭塞的小山村，村子里居住有七八户人家。其中有一所砖瓦木质结构的普通农家房舍，坐东朝西，共有平房 23间。平头槽门，土砖围墙。这所宅院始建于清乾隆五十年（1785 年），它依山傍水，座落在风景幽美的山间。房子的左边是马里山，右边是大树山，山上苍松挺立，树木茂密，一条清清的泉水自后山峻岭的石隙中涌出，绕宅而流，山光水色，将房屋映衬得格外美丽。

1876 年 5 月 27 日（清光绪二年农历五月初五）这天是端午节，大喜之事降临在这个院落。在院内堂屋右边正房前的卧室里，随着一声啼哭，一个新生命诞生了。他，就是何叔衡，家谱名启璿，字玉衡，号琥璜，学名瞻岵。

何叔衡诞生的那个年代，正是中国广大农村残破不堪、经济凋敝的时期。这主要是连续不断的战争和清朝官兵的烧杀劫掠所造成的，此外，自然灾害频仍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1876 年至 1879 年间，南北各省分别遭受严重的水灾和旱灾。湖南省是受水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这里的农民经受着天灾人祸的袭击，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何叔衡居住的杓子冲，百姓也是缺吃少穿，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何叔衡家是一个典型的农民家庭，未分家时，全家三代同堂，叔伯兄弟共 40多口人，靠着约十二三亩田地生活。由于家庭人口多，餐食 6 桌，日子过得也很紧张。后来又在横山湾租种了一些田地，才勉强渡日。但是同村内其他几户农民比起来，他的家境还算稍好一些。

何叔衡的父亲何绍春，是个勤劳朴实的农民。他为了养家糊口，除在家种地外，每年还利用空闲时节，到洞庭湖沿岸一带做两三个月的短工，赚些钱米补贴生活。何叔衡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一个弟弟。他 5 岁时，母亲去世，父亲一直没有再娶，全

家的生活靠父亲一人支撑着。由于家中粮少，遇到青黄不接的年景时，何绍春就让子女们定量吃饭。何叔衡 7 岁开始干活，学着放牛、割草、砍柴。但每到吃饭时，总是因年小劳少，每餐只限吃一碗饭，于是他常常喊饿。有一次，他放牛回家，几口吃完定量的那碗饭后，便望着姐姐说：“吃饭要是像牛吃草那样能放肆吃饱就好了。”父亲听后，忙对他说：“你长大了像牛一样地做事，一定会吃得饱的。”何叔衡牢牢地记住了父亲的这句话，直至他为革命献出生命，始终是“像牛一样地做事”。

后来，在父亲的操劳下，何叔衡家基本上过着自己养猪、种菜、种稻的自给自足的生活。1917 年暑假期间，毛泽东和萧子昇步行漫游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 5 县时，曾在何叔衡家住了 3 天。何家的生活，他们印象颇深，在 50 年代，萧子昇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说：

> 吃过早饭以后，何老先生领我们去参观他的农场。一个猪栏里面有十只猪，有白的，也有黑的。这些黑猪是何老先生最宝贵的财产了。一只肥大的猪除去背上的黑色斑点，简直是浑身雪白，看起来竟像只小牛。毛询问这猪的重量和养了多久，何老先生笑着答道：“这只猪大概有三百二十斤重。猪若长到两岁，我们就觉得它的肉太老，不够鲜美了。这只猪只有十一个月大。
>
> ……
>
> 我们平生尚未曾见过这样优良的猪种，因此在猪栏之前徘徊了好一阵子。何老先生笑着说道：“你们可有了作诗的好题材了！”后来我还确曾在日记上写过一首题为“肥猪”的短诗。
>
> 当我们从猪栏向菜园走去的时候，何老先生说道：“这

些猪是我们家产中的宝贝。没有这些猪，我们的生活就很难维持了。今年的肉、油、茶、盐等开支都是从它们身上得来的，还有盈余。真的，没有这些猪，我们实在难以为生。”……

开阔的大菜园里长满了鲜美的蔬菜；园中整齐清洁，一根杂草也没有，这尤其使我们惊叹。……

……

我们参观了何家的稻田。那些稻田当时还是满灌着水，但新的秧苗已经透出了水面。……这些稻子可供他们全家一年之需。……

……何老先生带着我们去看他的树林。何家所用的柴禾都是出自这片山林。何家的树林中大部分都是松林，但其中也有许多我们并不熟悉的树。一面山坡上长满了竹子，这样不但春天能吃上幼嫩的竹笋，而且将来成材的竹子也可供种种家用。……[1]

何绍春不仅为这个家劳累一生，而且他还是一位非常正直而又深谙世情的人。他的“一概要公”、“世间只有私心坏”的朴素思想，深深地影响着他的子女们。1926年8月，他临终前还给孩子们留下这样的遗嘱：

余年八十零，难道还贪生吗？你们娘早死，我教养你们未争得一个什么局面，只望你们兄弟合好合力将债还清。一概要公，世间只有私心坏，事情公则大家都安。叔衡抚九孙为嗣莫撒手。我死了不做道场，不烧纸钱冥屋，不劳动亲朋，只行几堂神，装殓不用一根丝，葬于就近就是。切

记切记！[2]

何叔衡就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逐渐长大成人，并且懂得了做人的基本道理。他在父亲的引导下，从小就乐于帮助别人，是一个极富同情心而且感情热烈赤诚的人。与他同时代的乡间亲友提起何叔衡助人为乐的事，总能举出许多感人的事例：有时家里来了逃荒要饭的人，何叔衡宁可自己不吃，也要把碗里的饭倒给那个人；每当何叔衡看到破衣烂衫、衣不遮体的穷苦人时，他就主动脱下自己身上的夹衫送给这个人；何叔衡在少时读书期间曾主动帮助生活困难的同学何幼之交学费，此事得到了父亲的赞扬和支持；有几个穷苦孩子，偷偷地挖何家的芋头，何氏父子不但没有斥责他们，反而担心他们逃跑时摔伤，并主动送给他们芋头吃。何叔衡一生所作所为，始终受着父亲“公道为人”思想的影响，并把它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启蒙于私塾

何叔衡的诞生，不仅给全家带来了欢乐，而且也给他自己带来了特殊的“福气”。当时，宁乡农村流传着一种迷信说法：“男子要五（午）不得五，逢五就有福。”也就是说，生辰逢五是很难得的，是最吉祥、最幸运的事。何叔衡恰是生于五月初五，在堂兄弟中又排行第五，因而亲友们都认为他“八字”好，将来会有“出息”，纷纷前来他家祝贺。他的父亲也信以为真，于是节衣缩食，省出钱来供他一人读书。在这种传统迷信观念的影响下，何叔衡获得了许多受教育的机会。后来，何叔衡曾对女儿实山、实嗣说：“我读了书，我的两个姐姐、两个哥哥和一个弟弟几乎一天书也没有读，都是文盲。我是靠你们几个伯伯叔叔的劳动才读成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书的。书都由我一个人读了。”[3]

何叔衡从 12 岁到 22 岁，除中间有两年在家种地外，在几家私塾学堂读了 8 年书。这期间，塾师姜方谷对他的思想影响颇深。姜方谷曾在外地做过小官，眼界比较开阔，学识也较渊博，藏书颇多。他一生性格耿直，从不愿随俗浮沉，并对当时清政府的腐败懦弱深表不满。

1894 年 7 月到 1895 年 3 月，历时 8 个月的中日甲午战争，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导致清军在战争中惨遭失败。战败后，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把辽东半岛和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包括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等等。《马关条约》进一步加速了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步伐，中国面临着被世界列强肢解和瓜分的严重危机。这时的中国，“看起来已经是个奄奄一息的巨人。帝国主义列强，一群饿狼一样争先恐后地扑上来，撕裂这个巨人的肢体，吞噬这个巨人的血肉，并且因此而在它们相互间引起了激烈的矛盾和斗争”[4]。此后，俄、英等国争先恐后地掠夺在华利权，强租海港，划分“势力范围”，并向中国大量输出资本等等。

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清政府不但不进行反抗，反而对外屈服于帝国主义压力，对内实行残酷的镇压，这就更加激起全国人民对清政府的强烈不满。当时，反映在一部分开明的地主官僚知识分子中，则表现为维新变法运动走向高涨，反映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则表现出反帝反封建革命逐步上升的形势。到 1898 年，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接近于高潮。

在这期间，具有民族自尊心的姜方谷塾师，在给学生们讲课时，经常用历史上民族英雄的事迹，启发学生的爱国爱民思想，激励学生的爱国热情。有一天午后，姜先生布置学生自己读书，他到隔壁帮人家写对联。何叔衡的堂弟何梓林趁此机会在姜先生的

书案上拿了一本《岳飞传》，便聚精会神地读起来，当姜先生回来已站到他的面前时，何梓林竟没有发觉，当时与何梓林一起读书的何叔衡却替何梓林捏了一把冷汗。但是这次姜先生并没有惩罚何梓林，而是给学生们讲起了岳飞的故事。岳母刺字——精忠报国的壮烈，南宋小朝廷苟且偷安，无心收复失地的耻辱，岳飞为了民族利益浴血疆场，而最后却死在奸臣秦桧手中的悲愤，都深深地打动着学生们的心。此后，姜先生还多次讲到岳飞，并满怀激情地吟诵岳飞的《满江红》词。他还经常给学生们讲中国近代史上发生的事情，林则徐虎门销烟，鸦片战争中清政府签订的一个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以及三元里人民抗击英军等等，都是课堂上的讲授内容。这些，都激发了学生们的爱国热情。

何叔衡在姜师门下读书 4 年，不仅认真学习掌握塾师所教的经书内容，修完了四书、五经，阅读了大量历代名著，而且还在姜先生的启迪引导下，逐渐对当时的社会制度产生不平之感。尤其是他亲眼目睹在清政府的统治下，官吏横行，豪绅肆虐，苛捐杂税繁重，人民生活困苦的社会现实，更加激起他对清政府反动统治的愤慨，对贫苦的劳动人民的同情。他的这些思想主要反映在他当时撰写的文章中。

1895年夏，适逢大旱，青黄不接，饥民成群结队行乞。面对这般情景，姜方谷先生给学生们出了一个作文题目——《旱》。夜晚，何叔衡坐在灯下认真思考。他的脑海中浮现出白天的情景：烈日炎炎，禾稻枯焦，塘干池涸，热气蒸腾，还有那三五成群满街乞讨的饥民；同时，他又想起那些横行乡里的官绅和姜先生所说的那些令人痛恨的腐败朝政。于是，他拿起笔来，将自己感世忧民的思想倾泻于纸上，一篇以《旱》为题的文章作好了。他写道：

即旱以惟罕譬之，知虐政之为害深矣。夫旱，固亦

仁爱者也，乃今日之虐民者竟如此，不可即旱以罕譬之乎？且今日之天下，一酷烈之天下也。其万姓之如炎如焚者，岂不甚于旱魃之为虐哉！顾无形之旱，民嗟荼毒，司牧者或不知草野之薰蒸，惟即有形之旱以显形之，则蕴隆致虫虫之慨，山川有涤涤之容，当必知此不为福矣。嗟嗟 !何 辜今之人而竟罹此酷烈之祸而不可遏也！[5]

何叔衡的这篇文章，以犀利泼辣的笔锋，矛头直指清政府的暴政虐民问题。该文寓意清新，思想进步，有力地抨击了清政府的反动统治。

何叔衡在读私塾期间，还通过阅读宁乡爱国知识分子周汉（字铁贞）的《仇洋人歌》等著作，受到爱国主义的思想教育。周汉，当时是在籍的陕西候补道，他从 1891 年到 1897 年，多次书写反对英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歌谣揭帖。 1891 年春，他首先刊刻了一本朱墨套印的反洋教的通俗图画，题名《天猪教》。此后，各色各样的歌谣揭帖随手写来，又随手粘贴到街头墙壁上去，种类尤多。一些歌谣揭帖至今仍在湖南流传。例如，歌谣中说：“英国鬼子真讨嫌，压制我买鸦片烟。美国鬼子惹不得，助运鸦片害中国。”又说：“中华素称礼义邦，国泰民安都尊敬，自从鬼子到中华，富强害得成贫困。不独通商传教人，假名游历数不尽。甲想夺我筑路权，乙想矿产齐吞并。鬼子心比虎狼凶，合力驱除须鼓劲，果然万众一条心，包管中华能致胜！”[6]周汉的歌谣揭帖触动了湖广总督张之洞，1892 年 1 月，他在发给清政府外交总署电文中说，湖南在籍陕西候补道周汉，素好攻诋洋教，编成歌谣图画极多，刻字铺不肯代刻，乃自教其诸子皆习刻字，专刻诋洋教之书，刷印数十万本，托人各省分散。屡饬湖南湖北两省查禁不遗余力[7]。1893 年 5 月，清政府革除周汉的候补道官职，将他押

送宁乡官府看管。1897 年山东教案发生后，德军乘机强占胶州湾。周汉立即从宁乡来到长沙，又复刊印大量揭帖歌谣。有《鬼教该死》、《棘手文章》、《擎天柱》、《灭鬼歌》、《禀天主邪教》等图画书刊。并散布各县，对当时湖南的反洋教运动具有一定影响。翌年，湖南巡抚将他逮捕，从宁乡原籍押解到长沙监禁。审讯时，他愤怒地打坏了候审所的器物。他的晚年是在狱中度过的。

姜方谷塾师的思想启蒙，周汉爱国主义思想的教育，对何叔衡早期思想形成具有很大影响。

何叔衡在私塾学堂读书时非常勤奋，经常利用空余时间读书、写字。有时他同父亲一起上山砍柴，在休息时就用木棍在地上练习写字；有时在家煮饭烧火，他就用夹钳在灰里写。一天晚上，何叔衡和父亲睡在一起，父亲一觉醒来，只觉得大腿上像有只跳蚤在爬，猛力用手一按，按住的却是儿子的手。原来，何叔衡并未睡觉，他正在父亲腿上练习白天在学堂里所学的字。何绍春见儿子读书如此用功，特地为儿子买了一个小墨盒。此后，何叔衡随家人走亲访友时便带着小墨盒。一次，何叔衡到外公家去拜年，全家人吃饭时，却不见何叔衡在桌旁。于是，家人四处寻找，最后在楼上找到了何叔衡，看见他正在那里聚精会神地看书、写字。还有一次，何叔衡在桐油灯下练字，姐姐在一旁纺纱。突然有一股烧焦的味道，姐姐先是看看自己身上有没有烧着的地方，发现没有时，再一看，只见何叔衡写字的桌子底下正冒着烟，烧焦味正是从那儿来的。原来，由于天气寒冷，姐弟俩在桌子下面烧了几砣火炭。当时何叔衡练字非常投入，竟没有发觉自己的裤脚边已被烧着了。

何叔衡在私塾学堂读书时还结交了几个要好的朋友。他的堂弟何梓林与他私塾同窗，在别处私塾读书的夏果雅和谢觉哉，通过多次交往，也成为好友。4 个人中，何叔衡年龄大一些，大家都

称他五哥或老五。他们几个人在一起，经常外出游玩。有时他们步行几十里登上海拔 1000 多米的沩山，观看拥有百余僧众的大寺院中钟磬交鸣、晨钟暮鼓、法螺佛号的热闹场面，以及那些淄衣羽客和善男信女们虔诚的顶礼膜拜。有时沿着涓水而上直达发源地七里山，又沿着弯弯曲曲的山道蜿蜒而上，直达山顶过龙田，最后进入古老的西南重镇保庆府。他们在一起游玩时，更多的是共同探讨学问。他们经常研讨《纲鉴》、四书五经中的某些段落和语句，了解古代圣人的思想主旨。他们还谈论诗词、小说，有时眉飞色舞地讲《三国演义》“三言”“二拍”上的故事。通过交谈，既巩固了学习内容，又增长了知识。

1898 年初秋，何叔衡告别了他的最后一个私塾先生姜方谷，回到了家里。第二年，他按照父亲何绍春的安排，到肖家初堂帮着教蒙馆，从此走上教书生涯。

乡间“穷秀才”

1902 年 7 月，何叔衡遵从父命，参加县科举考试，得中秀才。这年他 26 岁。由于何叔衡性格豪爽，笃实刚介，思想开朗，且具有民族正义感，因而他虽是清朝秀才，却不愿为朝廷做事。尤其当年清政府再次镇压义和团运动，更加激起他对清政府的不满。

1900 年，轰轰烈烈的义和团反帝运动在帝国主义和清政府的联合镇压下遭到失败。但是，革命的火焰并没有因此而熄灭。由于义和团运动后帝国主义仍变本加厉地侵略中国，而清政府又在“变法”的幌子下加重对人民的压迫，因而全国革命形势迅速恢复和发展。北方义和团运动中的许多活动分子在失败后奔走到南方一些地区，其中有些人到了四川，同当地有斗争传统的民间秘密结社结合起来，重新举起义和团的旗帜。 1901 年 4 月，川东一带

的义和团以“灭清剿洋兴汉”为口号，到处设棚练拳，号召人民起义。1902 年，从资阳开始，川东各地以至川北、川南的一些地方爆发了抗拒官兵、焚毁教堂的群众斗争。同时，在直隶省南部，广宗武举景廷宾率领广宗农民与巨鹿、南宫、威县等县农民，举起“扫清灭洋”的旗帜继续战斗。但是这些起义先后遭到清政府的残酷镇压而告失败。

就在这一年，湖南的反帝运动也开展起来。 9 月 11 日，邵阳秀才贺金声树起“大汉灭洋军”的大旗，发动武装起义。接着，衡阳、湘乡、宁乡、武冈、新宁等县的哥老会也纷纷起来响应，但不久即被湖南巡抚俞廉三镇压下去。对此，何叔衡深感“世局之汹汹,人情之愤愤”。11 月，当县衙门派人送来请他去掌管钱粮的任职书时，何叔衡拒绝到职视事。他宁愿在家乡种地，以教私塾为业，过“穷秀才”的生活。此后，乡亲们都称他为“穷秀才”。

何叔衡在乡村教私塾 6 年，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年在他门下读过 3 年书的刘 华陔，对其老师仍记忆犹新。 1980 年 5 月 4 日，刘 华陔回忆了何叔衡教私塾的情况。他说：

> 他教私塾收费比别人低。那时中了秀才的教私塾至少得八九十担谷一年，他得四五十担谷一年就满足了。我在别的先生那里读书，要出七八块光洋一年，在他那里读书，我拿出五块光洋，他还说不必交那么多。家里穷一点的学生，他只收一块到两块一年，也有个别的没有收过学费。他《四书》、《五经》也教,但教得最多的是《楚辞》、唐诗、宋词，还讲岳飞、文天祥和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八国联军的事，时常讲得流泪。他和学生很合得来，总是鼓励我们努力读书。他喜欢到学生家里串门，也常邀学生到他家里作客。学生和家长都很喜欢他。但他对学习要求很严，书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背不得，他就发脾气。[8]

何叔衡的私塾学堂开课后不久，有一个十多岁的男孩天天站在教室窗外听课，手里常常拿着一把割草的刀。何叔衡发现后，便上前询问。原来这男孩姓李，住在离学堂不远的李家冲，因为想读书而家中交不起学费，便利用每天出来割草的空闲时间，站在窗外听课。此事使何叔衡深受感动，他便让孩子进教室听课，而且把他当成自己的学生。一年后，孩子的父亲知道此事后，凑足两块光洋，使孩子正式入了学。

何叔衡在教私塾期间，还经常到“小金陀馆”同他早已熟识的同乡好友谢觉哉，以及在此结识的姜梦周、王凌波共同探讨问题。“小金陀馆”是一家很著名的私塾，它位于宁乡县西部沩山和官山南侧堆资山山庄对面的一座低矮的凹字形山下，是一幢南方农村常见的“八”字槽门瓦房。这家私塾是由袁家湾一岳姓豪绅主办。1901 年春天，岳姓豪绅受聘外出，一位叫李藕苏的前清秀才，从 30 里外的巷子口到此主教。由于李藕苏的才学和正直在乡里远近闻名，因而前往求学者有二三十人。这一年，家住萧家湾，离私塾很近的谢觉哉和居住在五里堆罩鼓冲的姜梦周到此就读。第二年春，居住在八都王家大冲的王凌波也到此学习。从此，何叔衡、姜梦周、谢觉哉、王凌波 4 人开始了“总角”之交。由于他们是同乡，彼此情趣相投，又志向远大，以致成为最要好的朋友。他们中最年长的是何叔衡，次为姜梦周，再者为谢觉哉，年龄最小的是王凌波。姜梦周、谢觉哉、王凌波在小金陀馆读书 3 年，小金陀馆已成为他们 4 人切磋求学之道、谈古论今的好场所。

这时，何叔衡一面教私塾，一面抓紧时间努力自学。他学习的范围很广泛，涉及经、史、子、集，尤其注重研究历史、地理和人生观问题。他学习时，还经常带着问题去学。例如：注意用

汉唐盛世时中国的繁荣强盛来对比当时深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中国社会现实，并提出为什么历史前进了 1000 多年，子孙还不如祖宗的问题，力求通过阅读历史书籍来寻找答案。

何叔衡在日记中写了大量的读书笔记，他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正月二十三日的日记中写道：“阅《文章轨范》，胡澹庵先生《上高宗封事》，论王伦、秦桧之奸，真觉慷慨痛快，读之如见须眉之闪闪欲动也。”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正月十二日的日记中写道：“自阅朱子书（朱子年谱），于存养功夫，自觉略有把握，但不免暴寒之不敌耳。”同月十七日又写道：“颜子四勿（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曾子三省（吾日三省吾身），史册煌煌，已成绝诣。但降格相求，岂无自处哉？欲忿之来，如火之炽，节之！节之！遑云惩窒，谨志此以自艾。”同年四月二十五日，他写道：“阅《高士传》性理两卷，‘困辱非忧，取困辱为忧；荣利非乐，忘荣利为乐。’数语当铭座右。”[9]六月十八日，他看山东半岛地图后，写道：“自甲午之后，我国全师憯告，今俄租旅顺，英租威海，德强借胶州湾，渤海、黄海之防，蒙杳不知其下手也。”[10]何叔衡的这些读书笔记，充分反映了他的伦理思想和爱国激情。

何叔衡学习非常刻苦，在时间上抓得很紧，绝不愿在一些琐事上占用更多时间而影响学习。1907 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九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数日践亥迎寅，席未及煖，常为人摄去。一部奏议，阅六日始完，用功迟慢。如此计，所积两柜三簏之书，必十年始完。而十年沧桑之变，又不知何底！其蹉跎终古哉！”[11]何叔衡旧学底子深厚，原因也在于此。

何叔衡在乡间，经常替穷苦百姓说话，反对社会上不平之事。1906 年春，湖南省水灾严重，米价暴涨，宁乡是“春夏谷米昂贵，饥民排户索食”。农民们“吃排家饭”（就是吃地主大户）的一天

天增多，但是很快被官府豪绅所镇压，何叔衡对此愤愤不平。就在这年秋天，同盟会会员刘道一和蔡绍南自日本回到湖南。他们经过长沙明德学堂的学生魏宗铨而同醴陵、浏阳和江西萍乡一带的哥老会组织建立了联系，把这一带哥老会头目 100 多人组织起来，成立了洪江会。洪江会遂于同年组织发动了醴陵、浏阳、萍乡武装起义。随后，浏阳的洪福会首领姜守旦立即率部响应。武装起义爆发后，清政府大为恐慌，急令两江总督端方、湖广总督张之洞及湖南巡抚岑春蓂会合各省清军向革命军进攻，终将革命的武装起义残酷地镇压下去。这次起义，何叔衡受到很大启发，他在会党造反的影响下，邀集好友姜梦周、谢觉哉、王凌波、夏果雅及堂弟何梓林等，仿效会党形式，结拜为盟，他为“盟首”，为乡亲们打抱不平。

有一次，在何氏祠堂做长工的余某，因孩子饥饿，拿了祠堂一点稻谷，被族长抓住，要沉塘处死。何叔衡知道后，立即邀集盟兄弟闯进祠堂，救出余某。何叔衡带头造反的行动，乡亲们十分敬佩。

何叔衡虽是学旧学之人，但他从不承袭旧的封建礼教，封建伦理思想同样束缚不住他。 1898 年，22 岁的何叔衡同袁少娥结为夫妻。袁少娥比何叔衡大 3 岁，从未读过书，是个文盲，但她通情达理，勤劳俭朴，他们虽是旧式婚姻，但夫妻感情笃厚。婚后，袁少娥生的两个男孩都不幸夭折，只有两个女儿在身边。 1908 年，袁少娥又生一女孩。这时，亲朋好友们都怕何叔衡绝后，便联合起来，劝他纳“二房”以求子。何叔衡坚决不答应，他说：我有三个女儿也是一样嘛！于是他在大女儿实懿，二女儿实山的名字后边，为三女儿取名实嗣，表示何家有了实际的继承人。何叔以实际行动，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伦理观念发起了挑战。

后来，何叔衡参加革命，在他的教育引导下，二女儿实山和三女儿实嗣也参加了革命。何叔衡考虑到万一父女在外发生意外，家中仍有儿女侍候母亲，照料生计，便将大女儿留在家中，后出嫁在杓子冲附近。又将九侄过继为子。他的这种安排，充分表明他对妻子的一片深情。

注　　释

1 肖瑜著、陈重等编译：《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昆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86—89 页。

2 何实山、何实嗣：《忆父亲何叔衡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前后——从“穷秀才”到“一大”代表》，《新湘评论》 1981 年第 7 期。

3 同上。

4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册，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433 页。

5 转引自王兴刚、方大铭：《何叔衡》，《中共党史人物传》第 4 卷，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3 页。

6 杨世骥整理：《周汉与反洋教斗争》(附供词),湖南历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编：《湖南历史资料》 1958 年第 4 期，第 39—40 页。

7 同上书，第 41 页。

8 转引自王兴刚、方大铭：《何叔衡》，《中共党史人物传》第 4 卷，第 3 页。

9 转引自姜国仁、张生力：《四髯合传》，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5—6 页。

10 转引自王兴刚、方大铭：《何叔衡》，《中共党史人物传》第 4 卷，第 5 页。

11 同上。

第二章

走 出 家 门

云 山 任 教

1909年春，何叔衡受聘到离家 25 公里的云山高等小学堂任教。云山高等小学堂位于宁乡水云山下，距离县城约 45 公里。学堂的环境偏僻而幽静，它依山傍水，有三道高高的山岭环绕着校园，一条蜿蜒的小溪经过校门口，轻盈无声地流入沩水，校园前面还有一垅肥沃的田畦。校舍的建筑十分别致：前面是一堵半月形粉墙，两个拱形校门对称地开在东西两侧。108 间校舍全部按三横六竖的格局建筑，远远看去，好像是一座深山古刹。

云山高等小学堂的前身是云山书院，它始建于 1865 年(同治四年),是陕甘巡抚刘典告老回宁乡后,劝说士绅捐款捐田兴建的。校产田亩 1300 余石，作为书院经费来源之一。云山书院与县城玉潭书院齐名，当时，并称宁乡两大书院。 1905 年（光绪三十一年),清政府废除科举考试制度后,云山书院改为云山高等小学堂，堂长是文经酉。学堂的课程设置有读经、修身、国文、算术、历史、地理、格致、图画、英文、体操等。何叔衡在学堂任高年级的国文、历史、地理教员。

当时，一般人视云山高等小学堂为“洋学堂”，不愿送子弟到

此读‘洋书’,这是地方封建顽固守旧势力对“新学”的攻击造成的影响。

从 1895 年康有为等人的“公车上书”到 1898 年“百日维新”之前，维新运动普遍高涨，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与顽固守旧派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论战较为集中地反映了中国近代在文化思想领域中的中学和西学、新学和旧学之争。其中，改革旧的教育制度，废除科举，兴办学校是争论内容之一。维新派认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1] 顽固派则认为“:中学所以为教,人皆知之,无待别求门径也”,攻击维新派兴办学校是散布‘邪说’”‘名为培才,实则丧才’”‘且贻人心风俗无穷之忧”,[2]坚持尊孔读经、八股取士的封建教育制度不能改变。对此，维新派予以驳斥说：科举制度是封建统治者“牢笼天下”的愚民政策，“为中国锢蔽文明之一大根源”.[3]他们认为要使中国富强，就必须改革旧教育，兴办新式学校，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等等。

在维新运动中，湖南封建顽固势力的活动更为猖獗。他们采取种种手段，破坏维新运动。岳麓书院院长王先谦纠集一批顽固士绅向倾向和支持变法的湖南巡抚陈宝箴递交《湘绅公呈》，攻击梁启超、唐才常、谭嗣同等人使时务学堂的学生“不复知忠孝节义为何事”，并要挟陈宝箴“整顿”时务学堂，摒退梁、唐。当时，时务学堂的总教习是梁启超，分教习为唐才常等人。他们在时务学堂宣传维新思想，培养维新人才。当王先谦的无理要求未被采纳后，他又伙同大劣绅叶德辉、孔宪教等人，煽动他们控制下的 3 个书院的部分守旧学生，制定所谓《湘省学约》，制订“正心术”‘尊圣教’‘辟异端’等条规,以加强对 3个书院学生的控制，防止他们受时务学堂的影响。他们还著书撰文，大肆攻击“平等”‘民权’学说 逼走长沙南学会主讲人之一皮锡瑞,并给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